

# 清初歙县槐塘程氏的文化建构

卜永坚

[摘要] 本文对比1694年刊行的《两淮盐法志》和1673年刊行的《槐塘程氏显承堂重续宗谱》，展示徽州府歙县槐塘程氏宗族内部的江村派和岑山渡派在明末清初业盐致富，编写宗谱，其后江村派衰败而岑山渡一枝独秀并进而把持两淮盐法志的编撰的过程。宗谱是徽州商人内部组织机制之所本；盐法志是徽州商人向外争取文化认受性之所本。因此宗谱与盐法志成为明清徽州商人文化建构的必争之地。

[关键词] 槐塘；程氏；两淮；盐商；宗族

[中图分类号] K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04)05-0052-10

[作者简介] 卜永坚，助教，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 一

把明清时期的宗族现象理解为“文化建构”，不是说宗族现象是“虚构”的。相反，作为“文化建构”的宗族，不仅存在于人们的精神层面（例如：人们宣称自己与部分人拥有共同祖先、接受有关自己宗族的传说、尽管没亲眼看过但相信有关自己宗族的潜牒的存在），也存在于物质层面（例如祖先祠堂陵墓、以祖先名义拥有的族产、以子孙名义领取的胙金）。宗族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语言，它以文字为媒介，并得到明清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可。宗族现象的普及化，也就是宗族这种“文化建构”过程的普及化。这个过程的关键，就是对于书面记载的争夺、把持、垄断。因此，在宗族内部主导宗谱的编撰；在社会上尽力影响官方正史、方志、政书的编撰，就是明清时期宗族这种“文化建构”的必经之路。<sup>①</sup>

就学术史而言，明清徽州宗族的研究与明清盐政盐商的研究，可说是一个钱币的两面。明清盐政，由“开中”而变为“纲法”；两淮盐商，由山陕籍主导而逐渐变为由徽州籍主导；业盐致富之盐商，无不于经商同时，报效朝廷，捐纳官位，延请名士教育子弟以考取科举功名，交结缙绅，出版诗文以炫耀文化修养，巩固宗族提供慈善以博取社会认可，凡此种种，均为明清社会经济史之常识，而对于明清徽商的这些文化策略，史学界亦已累积丰富之研究成果。<sup>②</sup>明清时期家谱、政书、方志这类有关徽商的史料虽多，但其中线索既零碎又雷同，凭着零散的“点”，不易织出完整的“面”。以两淮盐商这个题目为例：有关明清盐商的具体经营过程如资金规模、借贷盈亏、管理结构等史料，迄今仍然缺乏，而即使不太涉及商业秘密的资料如盐商家族的成员及其辈分亲属关系等，也不易找到。近来，算是笔者造化，在一本清

<sup>①</sup> 有关明清宗族的研究，成果丰硕，难以枚举，但就本文而言，最具启示作用的，也许是科大卫(David Faure)视宗族为文化建构的看法，见 David Faure, *The Lineage as a Cultural Invention: the cas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Modern China*, Vol. 15 No. 1 (January 1989), 第4-36页。

<sup>②</sup> 有关徽州商人将商业资本转换为文化资本这一现象，可参考何炳棣著、巫仁恕译《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Harriet Zurndorfer,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Chinese Local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Hui-chou Prefecture 800-1800* (Leiden: E. J. Brill, 1989)。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版。

初徽州族谱和一本清初盐法志中,找到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似能反映清初活跃于两淮盐业的一个徽州宗族的文化建构过程。谨将有关发现,撰一短文,以就正于各位师友。

《槐塘程氏显承堂重续宗谱》,是清徽州府歙县槐塘程氏宗族之谱牒,编纂始于顺治9年(1652),出版在于康熙12年(1673)。<sup>①</sup>《两淮盐法志》,是两淮盐运使崔华委托同榜进士谢开宠纂修之盐政文书,刊行于康熙33年(1694)。<sup>②</sup>此二书,前者为私家文书,后者为官方政书,本似无甚相关者,然比较二书,即发现槐塘程氏在《两淮盐法志》中之独特地位。首先,崔华和谢开宠的序言,特别鸣谢程浚和黄暹,而程浚即来自槐塘程氏。其次,在《两淮盐法志》中,程氏是数一数二的大宗族,而程氏人物中,来自槐塘程氏者竟逾半数。兹将《两淮盐法志》的徽州籍人物,作一简单之量化分析。

## 二

康熙《两淮盐法志》(以下简称《志》),其《人物》六卷及《艺文》四卷,收录了大量人物资料,其中徽州籍和山陕籍人物共有429人。在这429人中,徽州籍人数为337(79%)、山陕籍人数为91(21%),证实了明中叶以后徽州籍商人取代山陕籍商人、主导两淮盐业的局面。这337名徽州人,就其姓氏分布而论,则汪、程、吴、方4姓人数最多,达196,占总数58%,其中汪、程2姓人数相等。(详表一)但是,由于这337名徽州人物,有妇女和早期人物,<sup>③</sup>不易看出明末清初两淮盐业中徽商之实相。因此,笔者把其中的妇女及16世纪以前之人物剔除,剩下274人。结果,其姓氏分布,仍无显著变化,人数最多的,仍是汪、程、方、吴,这4姓人数达168,占总数61%,其中程氏有47人。(详表二)

表一:康熙《两淮盐法志》337名徽州籍人物姓氏分布

姓氏	人数	比率	姓氏	人数	比率	姓氏	人数	比率
汪	53	15.73%	项	13	3.86%	蒋	6	1.78%
程	53	15.73%	郑	11	3.26%	马	6	1.78%
吴	50	14.84%	张	10	2.97%	闵	4	1.19%
方	40	11.87%	许	9	2.67%	王	4	1.19%
小计	196	58.16%	胡	8	2.37%	赵	4	1.19%
江	17	5.04%	鲍	7	2.08%	其余15姓	19	5.64%
黄	16	4.75%	孙	7	2.08%	总计	337	100.00%

表二:康熙《两淮盐法志》剔除妇女及早期人物后274名徽州籍人物之姓氏分布

姓氏	人数	比率	姓氏	人数	比率	姓氏	人数	比率
汪	48	17.52%	黄	16	5.84%	胡	6	2.19%
程	47	17.15%	项	12	4.37%	马	6	2.19%
方	38	13.87%	郑	8	2.92%	蒋	5	1.82%
吴	35	12.77%	许	7	2.55%	赵	4	1.46%
小计	168	61.31%	孙	7	2.55%	其余9姓	13	4.74%
江	16	5.84%	张	6	2.19%	总计	274	100.00%

资料来源:康熙《两淮盐法志》,卷19—24,26—27。

表二的47名徽州籍程氏人物中,原来籍隶歙县岑山渡者为数最多,达24名,竟占去一半;其次为籍隶歙县江村者,有7名。仅此两处程氏人物,已占总数66%。(详表三)

① 该谱藏上海图书馆,编号911074—79。该谱提要,见上海图书馆编、王鸣鹤等主编,《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上海图书馆2000年版,第825页。笔者2002年7月赴沪阅读该谱,得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指导,又得上海图书馆陈乐民先生协助,特此鸣谢。

② 谢开宠总纂《两淮盐法志》卷28,康熙三十三年(1694)刊,中国史学丛书42,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影印本。

③ 例如“鲍孝子”鲍元凤,是元末明初之人,见《志》,第2057页。

表三：康熙《两淮盐法志》中 47 名程姓人物的籍贯分布

籍贯	名字	人数
歙县岑山渡	宗孟、其位、其禄、濬、湜、文正、淞、大功、之藻、新元、浚、朝宣、埏、铨、材、默、然、廉、烈、量越、用昌、之秬、量入、之鍊	24
歙县江村	起骥、式琦、式仪、式传、文铭、檣父子 2 人	7
歙县南市	仲台、国明	2
歙县荷花池	有容、澎	2
歙县	鸣凤、封、培、鑣	4
休宁县	尔昱、建	2
徽州府	日休、日孜、罔远	3
不详	霖、俊、感	3

资料来源：康熙《两淮盐法志》，卷 19—24, 26—27。

这些程氏人物既拥有县以下的共同地望，根据常识，说他们是同宗同族的成员，虽不中亦不远矣，而且《志》也经常提及他们的亲属关系，例如表三的仲台、国明即为父子。但是，凭常识想当然是不可取的，而且《志》的资料，也太过零散。对于《志》的研究，至此已到了尽头。幸好，《槐塘程氏显承堂重续宗谱》的出现，使研究有所突破。原来，这 47 名程氏人物中，来自岑山渡的 24 人，与来自江村的 7 人，竟同属槐塘程氏，证据来自《槐塘程氏显承堂重续宗谱》，该谱对《志》中的岑山渡 24 人与江村 7 人，大部分都有所记载。（详表四）

表四：康熙《两淮盐法志》记录的 31 名歙县槐塘程氏人物

姓名	支派	辈分及关系	《志》页数	《谱》卷数页数
檣	江村	八世祖	1553	16:7b—8b, 18b
……	江村	八世祖檣子	1553	……
起骥	江村	九世祖	1459	16:7b—8b, 23b
式琦	江村	九世祖起骥侄	1460	16:7b—8b
式仪	江村	九世祖起骥长子	1460	16:7b—8b, 29b
式传	江村	九世祖起骥二子	1460	16:7b—8b, 29b
文铭	江村	九世祖起骥孙	1460	16:7b—8b, 38a
材	岑山渡	六世祖	2099	13:10a, 16b, 87a
默	岑山渡	六世祖材长子	2099	13:16b, 87a, 28b
然	岑山渡	六世祖材二子	2099	13:16b, 28b—29a
廉	岑山渡	六世祖材侄	2099	……
烈	岑山渡	六世祖材侄	2099	……
大功	岑山渡	九世祖	1553	13:19a—21b, 47a
之藻	岑山渡	九世祖大功孙	1701	13:19a—21b, 78b
新元 i	岑山渡	十世祖浚父	2051	13:19a—21b
浚	岑山渡	十世祖	2051	13:19a—21b, 63a
铨	岑山渡	十世祖浚兄	2099	13:16b, 87a, 58b
量越	岑山渡	十世祖	1521	13:19a—21b, 61a
用昌 ii	岑山渡	十世祖量越二子	1521	13:19a—21b, 77a—b
之秬	岑山渡	十世祖量越六子	1521	13:19a—21b, 77a—b
量入	岑山渡	十世祖	1556, 2051	13:19a—21b, 61A

续表

姓名	支派	辈分及关系	《志》页数	《谱》卷数页数
文正 iii	岑山渡	十世祖量入孙	1478, 1556	……
之猷	岑山渡	世祖量入长子	1556	13:19a-21b, 76b
潜	岑山渡	十一世祖	1478, 2099	13:16b, 74a
湜	岑山渡	……	1478	……
淞	岑山渡	……	1478	……
朝宣	岑山渡	十二世祖	2059	13:87a, 94a
坝 iv	岑山渡	十二世祖朝宣子	2063, 1703	13:87a
宗孟	岑山渡	……	1702	……
其位	岑山渡	宗孟长子	1702	……
其禄	岑山渡	宗孟二子	1455, 1702	……

i 据《谱》，程浚之生父为程大震，新元或为大震之字号。

ii 据《谱》，程量越二子为程陵，见《谱》，卷 13。

iii 程量入的孙子中，并无名“文正”者，程文正可能出生于《谱》刊行之后。

iv 程朝宣在《谱》中有五子，但并无名“坝”者，程坝可能出生于《谱》刊行之后。

资料来源：康熙《两淮盐法志》卷 19-24, 26-27, 《槐塘程氏显承堂重续宗谱》卷 13、16。

可见，《志》中的徽州程氏人物，原来 66% 均来自槐塘程氏。另外，槐塘岑山渡的程浚，更因参与编《志》而得到官方嘉奖。<sup>①</sup>为何槐塘程氏在《志》中占如此重要份量？难道纯粹因为程浚参与编《志》的便利？槐塘程氏是个怎样的宗族？其下的岑山渡派和江村派又有何独特历史？以下探讨这些问题。

### 三

刊行于 1673 年的《槐塘程氏显承堂重续宗谱》(以下简称《谱》)，凡 20 卷，除《卷首》外，头 3 卷记录程氏从始祖到迁居槐塘的谱系，次 17 卷记录槐塘程氏 17 个支派的谱系，一派一卷。这目录结构，与景泰二年(1451)程孟《新安程氏诸谱会通》、万历十四年(1586)程嗣功《续槐塘程氏宗谱》的目录，一脉相承。

徽州诸程，悉以东晋新安太守程元谭为共同始祖。而槐塘程氏之开基祖，则为程元谭 30 世孙程延坚。程延坚为公元 10 世纪时人，住歙县河西，“前临大溪，苦水患，弗获常宁，遂有迁居之谋”。一夜，梦得神示，谓歙县县城以西 15 里，“有佳境焉，宜于是建乃家，子孙其昌”。<sup>②</sup>遂于后周太祖广顺二年(952)迁居于此，即日后被称为槐塘之处。他“辟草莱，勤耕种，事业日新”，享年 76，娶方氏，生程信。作为槐塘程氏二世祖的程信，“充斥产业”，但“隐居不仕”。之后 4 代，均以“后承”形式(即领养继嗣)延续，<sup>③</sup>且都是单传，反映槐塘程氏这一时期甚为单弱，直至 7 世祖程大圭才现转机。槐塘程氏 7 世祖程大圭，号七太师，生北宋徽宗崇宁二年癸未(1103)，卒南宋孝宗淳熙二年乙未(1175)。他可能是乡村武装力量领袖。1120 年，他 17 岁那年，著名的“方腊之乱”爆发于徽州地区，7 年后，金兵攻陷开封，北宋亡于“靖康之难”。在中原板荡、两宋递迁的动乱时期，他居然“经营创业，积德行善”，育有 5 子，槐塘程氏从此丁财两旺，南宋期间，子孙繁衍，分出 4 派，4 派又再各自分派：(槐塘)在郡西十五里袞绣乡二十二都状元里，旧名程村。至宋，赠太师齐国公正，效王晋公故事，手植三槐于庭而居，又临大塘，故改今名。宋季时，分作四宅，后因谏斋公拜相，俱以府名之。祖居名旧府，丞相所居名正府，侍郎所居名上

① 两淮盐运使崔华的序云：“适岁贡士程子浚，留心世务，深悉盐法机宜，兼以渊源家学，众望所归。人物诸传，辄遐搜远讨，补见闻所未及。”《志》总纂者谢开宪的序亦云：“程子浚(按即程浚之字号)以湛深经术，熟晰盐政科条。凡因革之宜、利弊之要，皆能考镜原流，洞若观火。且徽、西(按即山西陕西)两籍诸书旧芳言懿行，不憚悉心谘访，加以论断。一切传记，多自为编订，匡余不逮。”见《志》，第 6 页、第 8-29 页。

② 《谱》卷 3，第 2 页 a。

③ 见《谱》卷 3，第 2 页 a。二世祖程信有三子：知柔、知宽、知侃，其中知宽“后承”，余二人无传。三世祖程知宽有三子：文绪、文龙、文聪，其中文绪“后承”，余二人无传。四世祖程文绪有二子：珉、弼，其中珉“后承”而弼无传。五世祖程珉有三子：宣、通、迁，其中迁“后承”，宣无后，通亦至五世而无传。六世祖程迁，又号四朝奉，有三子：大宝、大圭、大忠，其中大圭“后承”，余二人无传。

府,状元所居名下府。又有自下府迁居旧府之右者,名曰新宅。内二支迁同邑涪湖(在歙南孝女乡三十都,有自涪湖迁居郡南七里许家园)[按,即涪湖前派、中派];一支迁同邑黄山汤口(在歙北通德乡十三都);一支出继大程村□□乡三都(上府去);大程村一支转迁岑山渡,在永丰乡二十八都;一支迁水口大千(二十七都,上府去);三支迁绩溪县仁里[按,即仁里一派、仁里二派、市南派];一支赘岩镇丘氏(十九都);一支赘江村江氏[按,即江村派];一支赘凤凰汪氏[按,即凤凰派]。<sup>①</sup>有关旧府、正府、上府、下府这四派的历史,非本文重点所在。无论如何,最迟从1451年程孟《新安程氏诸谱会通》开始,槐塘程氏17个支派的结构已经形成。《谱》不过照抄如仪而已。这17个支派,在《谱》中往往被称为“九门十三派”,令人费解。笔者推测,九门,是指外迁的九派,再加上原有的“上、下、正、旧”四府,是为“九门十三派”,而论支派之实际数目,则为17。(详表五)

表五:《槐塘程氏显承堂重续宗谱》的17个支派

序号	支派名称	《谱》卷数	序号	支派名称	《谱》卷数
1	上府(包括前派,后派)(大千、岩镇附)	4	10	迁岑山渡	13
2	下府(包括新宅,又附永康)	5	11	迁凤凰	14
3	正府(包括永庆堂)	6	12	迁汤口	15
4	旧府槐阴堂	7	13	迁江村(包括槐壑)	16
5	旧府敦余堂(包括敦睦堂、余庆堂)	8	14	迁仁里一派	17
6	旧府孝友堂	9	15	迁仁里二派(包括市南派)	18
7	旧府世愿堂	10	16	迁涪湖(包括前派、中派)	19
8	旧府乐善堂	11	17	迁富溪	20
9	迁大程村(包括下长庆、下西坑)	12			

资料来源:《槐塘程氏显承堂重续宗谱》

以上是槐塘程氏的大故事,1451年的程孟《新安程氏诸谱会通》也好、1586年的程嗣功《续槐塘程氏宗谱》也好、1673年的《谱》也好,都予以重复。但是,谱牒之修纂,正如历史之编写,在“昭文献备征考”这类套语背后,有其迫切之政治目的与复杂之编纂过程。程嗣功《续槐塘程氏宗谱》如此,<sup>②</sup>《谱》的编纂也是如此。

#### 四

明末清初,九州鼎沸,槐塘诸程,兴衰不一。顺治九年(1652),战火尚未熄灭,槐塘程氏已经展开宗族重建工作:重建宗祠、重修宗谱。《谱》的编纂,始于1652年,但直至康熙十二年(1673),《谱》才正式刊行。这21年漫长曲折的过程,见证了槐塘程氏江村派的衰败、岑山渡派的崛起。现综合《谱》卷首的《序》、《重续宗谱通族公书》、《扬州来书》、《槐塘回书》、《凡例》等等,说明如下。

号召编《谱》的,是歙县槐塘老家的族长程衍道,他的招揽对象,是属于江村派、当时在扬州业盐的程慎(1595—1665)。程衍道至少两度致函程慎,程慎也有所答复,“向闻建祠之举,曾具小缄奉达诸尊矣”,内容不详。但程慎于顺治二年五月初七日(1652年6月12日)写予程衍道的信函,则清楚表明自己支持编《谱》工作,还提出各项具体建议,其中涉及筹款的一条云:“有能输至三千金者,特立主配享,

<sup>①</sup> 《谱》卷首,第1页b。按:“丞相”即程元凤,“侍郎”即程元岳,但下府的“状元”所指为谁,则不清楚,《谱》卷3并无有人中状元之记录。

<sup>②</sup> 以程嗣功编纂《续槐塘程氏宗谱》为例,该谱书稿刚刚完成,各派的角力就马上开始,“谱成,则闻同事中,有私一谱而为冯塘附序者,增一派而以铜陵阖人者。”冯塘一派,是篁墩程敏政之直系子孙,陵墓在范坑,“然直裰篁墩而尸范坑,何足以紊吾派!”问题尚不算严重,“若铜陵,则考之诸说,皆所不载,乃系族人而外迁,是驱狐袖于羊羔,是辩之不早,宜伪乱矣”。所以,对于企图将铜陵程氏混入槐塘程氏的五人,程嗣功特意刊列其名,附以简略但严厉之谴责字句。例如程师孟,被形容为“首谋以非族阖人,贪鄙嗜利,乡评不齿!”以上引文俱出自程嗣功《跋宗说后》,载程嗣功纂《续槐塘程氏宗谱》卷末,万历十四年刊,藏上海图书馆,编号917434-36。

其仪文较他加隆焉”，并真的捐出三千两白银以证明其决心。<sup>①</sup>程衍道大感欣慰，回信答谢程楨云：

頃抑若任自省中費專札見示。先是，已有兩緘寄孟侯、明初達上，不意遲遲尚未入台電也。所  
諭建祠修譜二說，規劃周詳，皆中肯綮，……計當吾世輿情所屬，惟老任先生可肩此絕業而不愧。  
緣是聚于眾而謀，咸推老任先生為主盟。<sup>②</sup>

约一个月后，顺治九年六月三日（1652年7月8日），程楨、程衍道、程兼、及族中读书人在显承堂  
订立编《谱》合同，《凡例》云：

此谱重续之举，江村派楨公创议，……族长衍道公率众覆札。会议既乎，遂于六月三日集里  
中缙绅文学，同诣显承堂，公立合同四张，一文会众执，一族长衍道执，一首事楨执，一联络兼执。  
分列嫌疑，任人搜事，而续谱始焉。顺治壬辰歲也。<sup>③</sup>

因此，我们可以把槐塘程氏重续宗谱的日期，定于1652年7月8日，又一个月后，顺治九年七月  
一日（1652年8月4日），程衍道正式向槐塘各支派发出《重续宗谱通族公书》，号召各支派踊跃支持  
编《谱》工作。江村派的程楨，是编《谱》工作的首事，这就表示，编《谱》工作，全由江村派主导。周渔  
《序》对此说得很明白：

考嗣功谱成在万历丙戌（1586），越六十七年，至本朝顺治壬辰（1652），已踰两世矣。程之先，有“三  
世不修谱者便为小人”之戒，江村族人楨闻而惧焉，时有合建统宗之事，因通其意于族长衍道。……（程  
楨）约祠谱，并举以显承堂为修所，出钱谷为供应，具举族人（程）兼为征事考实之人，兼既任奔走，不避  
劳瘁，凡三载而九门十三派之源流始集。甲午（1654），各门文学聚而修之。<sup>④</sup>

程楨号召槐塘诸程将各自拥有之族谱拿出来，以便综合修谱，以显承堂为纂修宗谱的场所，并赞  
助所有纂修宗谱的开支。他又委任程兼负责采访及核实资料，程兼往复奔走，不避劳累。这样，3年之  
后，槐塘程氏17门派（九门十三派）的数据搜集工作始告完成，顺治十一年（1654），纂修宗谱工作已进  
入写作阶段，1年后，宗谱付刻在即。孰料变故横生，程楨父子遇祸，纂修宗谱的工作中断了。程楨父子  
究竟遇上什么灾难？《谱》内各种记载，讳莫如深。出于同宗或姻亲之谊，都对程楨父子的不幸遭遇表  
示哀痛和愤慨。综合各类记载，似乎程楨于1655年遇祸，程楨次子程度渊又于1657年取得举人资历  
后“流谤被诬”，于是父子二人被流放。1661年，顺治帝崩，大概因为新君即位例必大赦天下之故，程楨  
父子获赦，从流放地转移至京师，赎罪报恩，在京师捐资兴建钟鼓楼，凡历7年而竣工，并因此获准返  
回扬州。但是，程楨父子究竟遇上何事，笔者始终无法找到史料线索。<sup>⑤</sup>

无论如何，程楨父子于1657年遇官非而遭抄家流放，1661年获赦，1665年程楨卒于扬州，遗骸由  
其子程度渊运返歙县安葬，丧事完毕后，编《谱》之事重新提上日程。这时，距离编《谱》工作的开始，已  
有13年了。江村派遭此一劫，人力物力已非昔比，实无法承担该项工作。又拖了3年，康熙七年  
（1668），编《谱》工作才得以恢复。但是，这次主导编《谱》的，已不再是江村派，而是以程量为首的岑  
山渡派了。《凡例》云：会楨公难作，中止，迨赐还，而以乙巳（1665）卒于广陵。岁戊申（1668），（度）渊、  
（起）周扶柩归葬毕，进主文会，语及谱事，歔歔泣下，（程）兼启榘出稿，宛然具备，渊因请梓于扬州，诸  
族长喜其善述，咸赆之。<sup>⑥</sup>

程度渊《重续槐塘宗谱纪略》也说：

① “（程楨）贊統宗祠于槐里，首捐三千金”，《谱》卷16，第18页b。

② 以上引文，俱见《谱》，卷首，第57页a。

③ 《谱》，卷首，第63页b—第64页a。

④ 《谱》，卷首。按：周渔自称是“年家眷弟”，即程氏女婿，他是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与程氏交情甚深，“渔与瀚为甲午（1694）同谱  
兄弟，在都门，则又识楨父子于郑侍御为光邸中，在扬，则置能、清、式琦，与诸同族人多有在扬者，悉得往来通名姓，在新安，则尝借兼  
与鹏舫为岑山南溪之游。年谊交情由来已久。”

⑤ 康熙《两淮盐法志》也只说程楨“以他事遣戍，为国家建大功，得放归，基业中落”（第1554页）。雍正年间噶尔寨纂修之《两淮  
盐法志》中，程楨传记只寥寥28字，干脆连程楨遇难一事也抹掉，“程楨，字宾梧，歙人。赋性端直，见义勇为。凡盐政因革事宜，毅然皆  
有经画。”见卷14，第54页b。另外，程楨父子既然在北京捐资兴建钟鼓楼，笔者也查找过以下北京方志或笔记，于敏中等纂修，《日下  
旧闻考》，收入《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影印），第497册，缪荃孙等纂修，《顺天府志》（光绪十二年刊本），收入《续修  
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版），第683册，吴长元，《宸垣识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版）等等，均无所发现。

⑥ 《谱》卷首，第63页b—64页a。

后此，渊以戊申(1668)扶先君榘归里葬。事毕，乃得请移梓维扬。既不征资，渊独力复不及。量能叔慨然同任之，自戊申迄癸丑(1668—73)，浩费甚大，量能叔殆强半焉。<sup>①</sup>

实际上，对于宗谱修纂工作，与其说程量能与程度渊同任之，不如说由程量能一手包办。周渔《序》对此有更详细的说明：

戊申(1668)冬，厥嗣度渊、起周痛绍先志，请稿来维扬，勉付剞劂。而多事之后，力已殫，不克计日以就。族人鹏翮为公书告合族。岑山渡量能慨然以佐成为己任，且咸谓前谱停刻，自己未至戊申(1655—68)，又十四年于兹，各派之未及续者宜更纪之。(程)兼遂不得以年老辞，向所经历仍一一躬诣采铄，约绅士之在扬者，得槐塘之望、岑山渡潜、<sup>②</sup>江村式琦、大程村元根、汤口頌、及量能、度渊，集三元道院踵其事，随稿随刻，癸丑(1673)春，刻工竣，计版一千一百有奇，命曰显承堂重续宗谱。是谱也，修于槐塘，刊于广陵，在壬辰(1652)，迄于癸丑，凡二十有二载。<sup>③</sup>

联络工作仍由程兼负责，但编《谱》的领导权已从江村派转到岑山渡派手中，而收录人事的年限又往后推移了14年。程量能承担出版工作，不遗余力，《凡例》有关“谱资”一项云：

前此各派捐输，惟江村派櫝公居多，从此移梓扬州，辑录三年，缮写镂刻四年，为版一千一百，积字八十余万，计用白镵盈二千余金，皆岑山渡量能、櫝嗣度渊、起周合力供应。至公所中撤而迓馆授餐诸费，则又量能所独任者也。<sup>④</sup>

终于，《谱》经历了21年的波折后，在1673年付梓刊行了。编《谱》工作，本来由江村派程櫝包办，只因程櫝在1655年遭受一场迄今无人知晓其内幕的官司，父子被抄家流放，家道中落，所以岑山渡派的程量能才得以取代程櫝，主持《谱》的后期编纂、出版工作。程量能《重修宗谱记述》，坦言编《谱》一事，自己本来无份参与，似乎还受到排斥，而且对于程氏前代宗谱，也没有多少掌握：

能儿时见一版本《司徒谱》(笔者按：即程嗣功《续槐塘程氏宗谱》)，知为家乘，遂购而藏之。后晤侄(程)兼，得阅《会通谱》(按：即程孟《新安程氏诸谱会通》)，其本更敝，乃叹旧牒之弗新而世系之何以续也！岁壬辰(1652)，行道叔祖与櫝兄有续修二谱之举。能时客居扬州，弗获与诸文会之末议，……戊申(1668)冬，度渊侄继父志，请梓前集于广陵，能慨任其事，始得参公论于同堂。<sup>⑤</sup>

这段文字，有意无意间流露出一丝酸味。岑山渡派和江村派各有何历史？其消长情形如何？以下根据《谱》和其它史料，予以探讨。读者将会明白，何以岑山渡派能够主导《谱》的编写以及20年后《志》的编写。

## 五

槐塘程氏岑山渡派，从明末至清中叶，是显赫一时的盐商家族。但其开基祖程诚，身世颇为寒微。他原居大程村，先被吴家收养，后在姐姐安排下，“赘庄上方翔斋公宅”，成了方家赘婿。方家无子，程诚继承方家财产，“后以庄上山水不协，迁居岑川，创业兴家”。他享年87岁，曾于“丁酉”年仗义疏财，从乡寇手中拯救两名亲友。<sup>⑥</sup>丁酉当为1357年，时值元末。之后的四代，均系单传，<sup>⑦</sup>且比江村派文化程度更低。直到五世程社宗(1436—1513)、昂宗(1454—1522)兄弟，才各有子孙繁衍，兴旺起来。明末清初，这两支均有子孙业盐致富、读书成材。

昂宗这一支里，首先业盐致富的，是九世程大功(1565—1648)。据《志》，大功“业盐淮北，……当明季饷匱，仗义输贖，佐军国之急，授武英殿中书”，可见程大功在明末经营淮北盐业而致富。有趣的是，

① 《谱》卷首，第60页a—61页b。

② 《谱》卷首，按：程潜、程浚同属槐塘程氏岑山渡派，程潜生于1639年，排第十一世，程浚生于1638年，排第十世。见《谱》卷13，第74页a、第63页a。

③ ④ 《谱》卷首。

⑤ 《谱》卷首，第59页b—60页a。

⑥ 《谱》卷13，第1页a—3页a。

⑦ 程诚生五子，只第三子梅有嗣，梅生三子，只第二子良保(1387—1437)有嗣，良保生二子，只第二子祖义有嗣。见《谱》卷13，第3页a、第4页a、第5页b、第7页b。

《志》虽云“(大功)子孙蕃衍,至百有余人。迄今五世,综理盐筴,世守其业”,<sup>①</sup>可是程大功七名以“玉”为名字部首的儿子,<sup>②</sup>一个也没出现于《志》,反而程大功以“日”为名字部首的侄儿,则在《志》中留下业盐的记录,例如程量入和程量越。这二人原来分别是程量能的哥哥和最小的弟弟。他们都是大功的侄儿,因为他们父亲程大典(1575—1652),是应赦之三子,大功为应表之独子,而应赦为应表之兄,所以大典、大功是堂兄弟。大典生五子:量入(1612—40)、量能(1616—?)、爽(1617—61)、量衡(1623—73)、量越(1626—87)。<sup>③</sup>《谱》和《志》只说大功、量入、量能、量越业盐,但这群伯侄是同在淮北业盐,还是各自发展,却没交代。幸好,程大典六世孙程钟(1786—?),在其《讷庵杂着》提供了重要线索:

吾宗自岑山渡叔信公分支,传至第九世曰慎吾公(笔者按:即程大典),是为余六世祖,由歙迁居于扬。子五人,长上慎公(即程量入)、次蝶庵公(即程量能)、次青来公(即程爽)、次阿平公(即程量衡)、次莲渡公(即程量越)。莲渡公即余五世祖也。莲渡公诸兄皆居扬,公一支来淮,为淮北商,居河下。其所居之宅曰五字店,五字乃旗名也。<sup>④</sup>

可见,在程大功经营淮北盐业时,其堂弟程大典则移居扬州,经营淮南盐业。后来程量越(大典最小的儿子)移居淮安业盐,其四名长兄则继续留在扬州。淮安为两淮盐运司淮安分司衙门所在,扬州则为两淮盐运司衙门所在,这两个城市分别为淮北、淮南盐业的中心,也是两淮盐商云集之地,岑山渡程氏踏足这两个城市,绝非随意的行为,应是刻意的部署。程量越“业鹺两淮,世居山阳”,在淮北行善,不遗余力。<sup>⑤</sup>他于康熙十三年(1674)出钱为被官兵擄劫的、路过淮安的妇女赎身一事,晚清地方志也有提及。<sup>⑥</sup>

社宗这一支里,业盐致富者,首推十二世程朝宣(1618—?)。他同样也是在淮北业盐。论辈分他晚于十世程量能,论年龄则相当。据《志》,他祖先“故有业在安东”,他本人年青时“担簦至淮上”,“独理盐筴”,“为淮北诸公祭酒”,也做了大量善事,“家业乃益大”。在这些雷同的文字之中,却也有新颖而重要的记录:

安东滨河,河岁为患。丁未岁(1667),茆良口决,闾邑将葬鱼腹中。君(程朝宣)急鸠工筑堤,堤成而水患永释。邑人感君德,许君子弟入籍(按当为“籍”之误)就试以报君。<sup>⑦</sup>

程朝宣以雄厚的财力,广施慈善,在1667年因抢险护堤有功,终于获得子孙在安东入籍、因此可在当地参与科举考试的优惠,而《谱》提及程朝宣3人有安东武生或安东庠生身份。<sup>⑧</sup>两段记载可谓互相发明。安东在淮安城北约25公里,淮北分司在此地设有安东巡检司,而程朝宣祖先“故有业在安东”,他的子孙又在此入籍,足见程氏对淮北盐业生产的渗透和控制。

从程大功起,到程量越、程朝宣,槐塘程氏岑山渡派在淮北经营盐业,成就骄人,到17、18世纪期间,臻于鼎盛。且看其后人程钟在《讷庵杂着》的追忆:

李元庚《梓里待征录》:“程氏,徽之旺族。由歙迁于河下几数支:曰公、曰亘、曰大、曰仁、曰五、曰鹤;皆支分派别之所名。国初时,业鹺筴计十三家,皆程姓,皆极豪富。……”(程景韩)覲(按:原文如此)案:《讷庵杂着·五字店旧宅墓记》有云:“当时族人业盐居淮,有所谓公字店、亘字店、大字店者,皆就主人名字中略取其偏旁用之,如亘字店,则用朝宣公宣字之半;吾家五字店,盖用慎

① 《志》,第1553页。这段文字明显本自《谱》,“公,字子懋,号明吾,应表公子。孝恭令德,实誉中孚,起家盐筴,缙绅随族,筑堤卫乡。世际艰虞,输家佐国,钦授武英殿中书。生嘉靖乙丑(1565)十一月九日,歿顺治戊子(1648)六月一日,享年八十有四。……”《谱》,卷13,第74页。最重要的分别,是《志》提及程大功业鹺淮北,而《谱》仅说他起家盐筴。

② 程大功七子分别为:珍、瑞、玘、球、琇、璐、玉,见《谱》,卷13,第47页a。

③ 以上诸人生卒年份,见《谱》,卷13。

④ 程钟《讷庵杂着》又云:“莲渡公,讳量越,字自远,生于明天启六年丙寅(1626),卒于国朝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捐职行人司副,生平好仁乐善,《两淮盐法志》有传,生子九人,俱成立。”又云:“余生乾隆五十一年。”俱转引自王光伯纂、程景韩增订,《淮安河下志》1931年序(《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16,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59页。

⑤ 《志》,第1521页—1523页。与《志》比较,《谱》的记录则极为简短,“字自远,大典公五子,生天启丙寅(1626)八月二十三日”,之后就是他妻子申氏生卒年份、继室鲍氏生年,以及子女名字而已,见《谱》,卷13,第61页a。

⑥ 文彬、孙云等纂修,《重修山阳县志》(同治十二年刊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414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影印版),第235页。

⑦ 以上俱引自程渡,《程封君传》,见《志》,第2059页—2063页。

⑧ 程朝宣四子中,坝、圻为安东武生,勑为太学生,培为安东庠生,《谱》,卷13,第100页a。



吾公吾字之半也。”<sup>①</sup>

但是，槐塘程氏岑山渡的盐业并不局限于淮北。前文提过，淮安只是两淮盐运司淮安分司所在，扬州才是两淮盐运司衙门所在，而且淮南盐的销售区（引地）不但面积广大，而且经济发达，所以向来淮南盐业利润高于淮北盐业。移居扬州的程大典绝不让移居淮安的程大功专美，大典长子程量入就是淮南盐商的领袖，他代表淮南盐商与政府谈判，成功地把湖南南部的衡州、永州、宝庆3府，重归淮南引地内。<sup>②</sup>从宋到清，这3府一直是淮盐官僚系统和粤盐官僚系统“块块”矛盾的战场，<sup>③</sup>程量入代表淮南盐商，夺回此3府引地，足见其财力和手腕，非同凡响。

槐塘程氏岑山渡派不但在两淮盐业大显身手，似乎也在两浙盐业有所建树。《志》的编纂者之一程浚（1638—？），与《谱》的赞助者程量能，同属岑山渡第10世，也同属昂宗这一支。程浚原名程希洪，是大震第3子，过继予大升（1575—1666），而改名浚。大升和大震分别为应御的二、四子，而应御排在应赦、应表等七兄弟之末，因此，程浚和程量能算是堂兄弟。《谱》云：“浚，字葛人，大升公继子，本大震三子，原名希洪，仁和庠生”。<sup>④</sup>重要的是“仁和庠生”4字，这是说程浚就读于杭州的仁和县官学。徽杭一水相通，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名为三江，实是一水，向来是徽州与外界交通的最重要水道，也是徽商前往两淮业盐必由之路，杭州是两浙盐运司衙门所在，因此也是两浙盐业中心。可以说，徽商踏足两淮之前，就已先踏足两浙，杭州因此形成庞大的徽商社区，徽商早在明末，已成功游说官方，在杭州建立专为徽商子弟而设的官学，在扬州，反遭山陕籍商人阻止。<sup>⑤</sup>程浚就读仁和县官学，这很有可能表示，岑山渡派内尚有成员经营两浙盐业。

## 六

槐塘程氏江村派，开基祖为程福得（1364—1416），他身世也不显赫，“少赘江村江氏”。明初，他帮助外家渡过不少难关，“中年置地，去外家数百步，构室居焉，人称新屋下”。<sup>⑥</sup>之后的几代，有行医者，有以诗文传世者，似乎拥有一定的文化水平。<sup>⑦</sup>但是，江村派成员业盐，则由八世程檠、也就是《谱》的前期赞助者开始。

程檠生于1595年，卒于1665年，与岑山渡派第一代盐商程大功（1565—1648）相比，辈分高一辈，但实际年龄晚了一代，也就是说，程檠业盐，必在程大功之后，也许还受到程大功的扶掖。笔者先介绍岑山渡，再介绍江村派，理由也在于此。程檠经营盐业非常成功，他“任光禄署丞，两逢覃恩，晋阶征仕郎，改补文华殿中书加工部侍郎”，这些虚衔，未必是他心甘情愿捐纳所得，但正好反映他的雄厚财力。程檠又“解组归江淮，家益振”，大概指他在扬州业盐。<sup>⑧</sup>

不幸，明末清初的战乱，对程檠造成严重打击。1645年，也就是“扬州十日”的这一年，程檠一家返回歙县家乡避难。其路线大概是从扬州南渡长江，再由杭州的钱塘江溯游而上，返回歙县。船抵严州，中夜失火。程檠长子、“上元县庠生”程起善，“奋身救援（程檠）而死”。<sup>⑨</sup>战乱平定后不久，程檠包办编《谱》工作，又与其次子度渊遭遇官司，被抄家流放，后遇赦而返回扬州，已如前述，不赘。

## 七

程浚既然在杭州读书，如何又到扬州编《志》？程浚对此并无解释，只说：“康熙辛未（1691），转运崔

① 转引自《淮安河下志》，第582页。

② “程量入，字上慎，歙县人，……及长，迁家扬州，治盐贾，审几度务，裨益靡政，未易悉举。如代众控部，得带办倒追盐斤银一百万两，又使衡、永、宝复归淮地额引，商膏腴焉。……”《志》，第1556页—1557页，另第2051页—2055页有更详细记载。

③ 参考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④ 《谱》，卷13，第63页a。

⑤ 有关明末徽商意图在扬州开设运学而遭山陕籍商人阻止一事，参见雷士俊《增见两淮运学议》，《志》，第2041页—2050页。

⑥ 《谱》，卷16，第1页b—第2页a。

⑦ 例如，福得长子宅相（1391—1459）“母病究医，遂得其瘳”，宅相长子济（1420—99），著有《立雪斋诗稿》，济第四子约（1463—1549），著有《紫芝稿》。见《谱》，卷16，第2页a—第3页b。

⑧ 《谱》，卷16，第18页b。

⑨ 《谱》，卷16，第24页a。

公，纂修《两淮盐法志》，缘人物、艺文，旧载未备，檄浚征采幽潜，庶成完帙”，他在《志》内的正式身份，是“参订”。<sup>①</sup>原因大概是他读书出身，文采出众。但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岑山渡派这一身份。《志》的编纂，始于1691年，时距岑山渡派赞助出版《谱》，已近20年，岑山渡派在这期间必定有更大的发展，在官方编纂的盐政文书中，“按比例”地体现其势力，可说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槐塘程氏岑山渡派既然在淮北、淮南盐业都如此成功，他们的成员也纷纷被载入《志》中，但对《谱》的编纂和出版贡献最大的程量能，却不见于《志》中。这是何故？由于笔者找不到相关史料，只好存疑。

槐塘程氏江村派和岑山渡派，都于元末明初由赘婿开创，都于明末业盐两淮而致巨富。正因为槐塘程氏江村派因1655年的官司而衰败，岑山渡派崛起，不但压倒其它程氏，也雄踞两淮盐业。因此，当槐塘程氏内部编纂宗谱时，岑山渡派取代江村派而包办其出版工作，并于1673年刊行宗谱，可说是后来居上。约20年后，当官方编纂盐法志时，岑山渡派从一开始就把持其写作，则是先发制人了。

史料所限，我们仍然无法知道槐塘程氏经营盐业的商业秘密（如资金规模、合股形式、经营组织、利润多少等等）。但是，《谱》的编纂，前期由槐塘程氏江村派主导，后期由岑山渡派主导。而《志》中程氏人物，一半来自岑山渡派。槐塘程氏内部编《谱》，必由当时最强大的支派主导，而两淮盐政衙门编《志》，槐塘程氏中最强大的支派，也全程参与。这不就是典型的文化建构过程？徽州商人的盐业帝国，不仅建立在盐业利润之上，也建立在宗族组织与文化认受性之上。宗族组织体现于《谱》，文化认受性体现于《志》。《谱》与《志》成为明清徽商文化策略的必争之地。我们对于明清徽州商人将商业资本转换成文化资本的这一策略，毫不陌生，对于各种方志、政书例必由当地当时最有势力的团体参与编纂的这一现象，也很熟悉。<sup>②</sup>但本文介绍的槐塘程氏修《谱》修《志》个案，却可以说是这种文化建构过程的细致的展现。另外，可以推想：如果槐塘程氏如此，那么，在《志》中出现的其它徽州大姓、尤其是与程浚一同受到官方鸣谢的黄暹所代表的徽州潭渡黄氏，也应各有其具体细节不同但性质类似的文化建构过程。这就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徽州谱牒中的史料，予以探讨了。

最后，必须指出，虽然“文化建构”的关键是对于书面记载的争夺、把持、垄断。因此通晓文墨的人，必然扮演重要角色；而通晓文墨的人，又以拥有科举功名者为尊。这样说来，是否只要拥有科举功名，就必然主导“文化建构”过程呢？这推论对于晚清的中国社会而言，也许是正确的，但就本文这个明末清初的个案来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虽然程浚这个通晓文墨的“仁和庠生”确实参与了《谱》和《志》的编撰，但其角色不过是纯粹的撰写员而已。就《谱》而言，前期江村派的主导人物是程懋，后期岑山渡派的主导人物是程量能，他们都是盐商，他们通过来自盐业的财力与管治宗族的魄力而建立其宗族内部的领导权与认受性。就《志》而言，程浚的角色可能更重，但也仍止于呼吁族人为《志》提供线索和投稿并润饰文字而已，《志》中对各程氏人物的描述和评价，必然仍由像程懋、程量能那样的实力派人物拍板。如此说来，“文化建构”是否就不重要？答案也是否定的。“文化建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提供了人们行动的认受性。富可敌国的盐商，如果缺少宗族这个被官方意识形态认可和鼓励的制度，就只能扮演为富不仁的奸商这个角色。宗族这个“文化建构”的威力，不在于人们内心中是否真正相信、接受它，而是如果缺少了它，一切都会变得名不正、言不顺。在珠江三角洲确立入住权的乡民如此，在扬州业盐的纲商也如此。

（本文初稿发表于2004年6月举行之第十届中国社会史年会暨礼仪、习俗与社会秩序国际学术研讨会，蒙会中各师友对本文提出宝贵批评，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王健）

<sup>①</sup> 《志》，第2051页、第2042页。另外，程浚还正式向“徽西托籍于兹（按即两淮）”的盐商，发出征启，呼吁他们提供自己或亲友祖先的传记数据，“各举所知，共襄盛事”。见《志》，第1957页—1960页。

<sup>②</sup> 最近，约瑟夫·丹尼斯撰文，探讨明代新昌县内有力宗族操纵县志的编纂的问题，见 Joseph Dennis, *Between lineage and state, extended family and gazetteer compilation in Xinchang County, Ming Studies*, vol. 45—46 (2002), 第69页—113页。

# Abstract

## **Comment on Shanghai Studies**

XIONG Yue-zhi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Shanghai Studies has always accompanied with many differences and controversies. Taking the study on history of Shanghai as the basis of Shanghai Studies, the article discussed the status quo of Shanghai Studies, the reason of prosperity of Shanghai Studies, and the discourse of debate on Shanghai Studies.

## **Sinology in Germany in 20th Century**

WANG Wei-jiang

In Germany, Sinology in scientific meaning took shape in early 20th century, while studies on China before were called as pre-Sinology. Beginning from the late of 19th century, pre-Sinology began to be transformed into Sinology. After World War , it became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and developed into an influential knowledge in 1970s. Being called as Chinese Study, it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on politics, economy, commerce and trade in modern China.

## **Wakeman and Study on History of Shanghai**

YE Bin

As a child, Wakeman had toured in the world with his parents, and finally became a people with cosmopolitanism. Meanwhile, as a real American, he was a regionalis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s for Shanghai Studies, by describing the activities of policemen and spies in Shanghai, he disclosed the reason that led to the failure of KMT government in the area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 **Retrospect on Historiograph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in 20th Century**

ZHU Zheng-hui LI Jiang-tao

Historiograph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in 20th century could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different stages, which was closely linked with social change, the trend of world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 **Clan System and Community Compact in Jiangsu, Zhejiang and Jiangxi Provinces in Ming Dynasty**

CHANG Jian-hua

Government in Ming dynasty pushed community Compact vigorously, which was combined with clan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introduction of community compact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clan. The improvement of autonomy of clan promote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lan and government. The combination of clan and community in Ming Dynasty had produced great influence on basic society.

## **Ancestral Hall and Lineage Society**

LUO Yan-chun

As the focus of the article, the ancestral hall of Wanzai Long family had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sinc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which accorded with the systematized process of the lineage, and also reflec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ivilized of state ritual" and localized of local society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Compiling Lineage Genealogy and Salt Gazetteer: The Cultural Invention of the Huaitang Chengs in Early Qing**

BU Yong-jian

This paper provides a solid case study of Huizhou merchants' success in salt trade and endeavours to strengthen their cultural legitimacy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By comparing the 1673 Huaitang Cheng lineage genealogy and the 1694 Lianghuai salt gazetteer, it demonstrates how the Cheng lineage in the county of Huizhou rose through success in Lianghuai salt trade and in turn dominate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genealogy and the gazetteer. Since the genealogy provided the vital mechanism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 (i. e., lineage) for Huizhou merchants, and the gazetteer consolidated Huizhou merchants' cultural legitimacy, it is only natural they became Huizhou merchants' "contested terrains" as far as their cultural strategy was concerned.

## **On Liu Family Indicating Auspiciousness: Research on Shandong Hero in Late Sui and Early Tang Dynasty (Part Two)**

LI Jin-xiu

Shandong Hero included those from Liyang and Wagangzhai and others from Douzigang and Gaojibo. The latter group was more influenced by non-Han nationalities in the north and west. When choosing new emperor, they considered that Liu Family indicated auspiciousness. Liu Family referred to those people from non-Han nationalities that had used Chinese surname. It was the result of national migration since North dynasties.